

# 我对临汝县大峪抗日根据地的回忆

●孔宪斌



## 我在区中队的工作情况

我叫孔宪斌,1925年12月出生于临汝县大峪乡孔窑自然村。我是1944年10月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临汝县大峪抗日区中队的。当时,临汝县抗日县政府的组成是县长党峰,区长董逢甲,县独立团副团长陈其双,区队长王天一。我负责大峪抗日区政府事务长工作。区中队下属有三个中队:张玉林中队、秦广善中队、王天一兼任一个中队。几个中队分兵设防,保卫抗日政府和抗日根据地劳动人民的生命财产。张玉林中队驻防在登、临交界地“毛岭”一带,随时抗击日寇和国民党登封县长杨香亭的武装从北边的进攻;秦广善中队驻防在大峪抗日根据地南部许台一带,抗击日寇和汉奸头子黄万镗从南边的进攻;王天一领导的区中队直属中队,经常驻在大峪店街和西邢坪村一带,抗击禹、郑两县的日寇和国民党县长席子猷从东边的进攻。每个中队约30余条枪支,没有重武器,全是步枪。生活上由几个行政村供给米、面,县政府供给菜金。

我在区中队工作时,日伪军先后对大峪根据地进行了数次的进攻和扫荡。

第一次是禹县的日伪军,集中了数百人,从禹县、临汝交界的东岭“狼洞岭”向我大峪抗日根据地进攻,由我区中队和民兵集中兵力进行反攻。战斗打响后,我陪同王天一队长,从大鸿寨的半山腰下去指挥反击日伪军。经过半天的战斗,迫使敌人退到禹县东车窑村。天黑时,我部队、民兵撤出战斗,守卫在东邢坪村和东沟营房。夜间,日本鬼子进行报复,来一个突然袭击,我区中队边打边退,突出了敌人的包围,撤回到河东一带。

第二次是二道山神庙的反击战,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汉奸头子黄万镗,从黄庄进攻大峪抗

日根据地许台秦广善防地。我陪同抗日县政府张清杰秘书,一同到二道山的山坡下助战,指挥战斗。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根据地军民打退了黄万镗匪徒的几次进攻,把敌人赶下二道山神庙。这次战斗,敌人遭受重大伤亡,秦广善中队未伤一人,胜利结束了战斗。

第三次是伪县长的失利到搞阴谋诱降。1944年12月的一天,区中队在西邢坪村驻防,登封县国民党县长杨香亭,从马玉川、小鸿寨山向大峪抗日根据地班庄、叶沟一带进攻。我当时负责后勤工作,供给前线部队生活食用。经过一天战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把敌人赶回到小鸿寨山上。就在我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敌人采取了明打、暗拉的阴谋诡计,把区中队队长张玉林中队长拉了过去。张玉林中队长又给王天一队长写了一封劝降书,派人送给王天一。因王队长不识字,我又是王队长的家族外甥,这时我已改任区中队文书,他叫我拆信念给他听,信的大意是:王队长,咱都是本地人,八路军站不住脚,老日来了他走了,老百姓受害。咱投靠国民党县长杨香亭有好处,他的势力大,咱也有靠山,他也不再打我们,咱合起来保护咱们这一带的老百姓。王天一听后很恼火,并发脾气说:“想叫我掉头,脚踏两船,不可能!我一臣不保二主,我不干。”我问王天一一回信不回信,他说不管他。事后,我把这件事向县委书记、县长党峰作了汇报。从此后,抗日县、区政府对张玉林中队长有了警惕。把他的中队调到东峪店街北头门楼上驻防,由区中队监视,后张玉林被我政府镇压了。

## 我调到县政府之后

我是1945年元月份调到抗日县政府工作的。当时,党峰县长安排我到皮徐支队35团政治处去学习除奸、保卫工作。学习半个月回来后,我就任抗日县政府公安干事。当时,抗日县政府没有公安局这个机构,只有我一个人。我在抗日县政府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抽调六个青年,组成减租、减息、倒地工作队,到各村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政策,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打击顽固派,争取中间派,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击日本鬼子和汉奸走狗,并宣传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还家政策,即穷人在民国31年灾荒时卖出去的土地,地主要无偿地倒给穷人的政策。因为当时大

峪抗日根据地四面都被日伪军包围,并不断地受到反动势力的进攻扫荡,所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抗日战争、保卫抗日根据地是抗日县政府的首要任务。其他的工作有空就搞,无空就停。我在县政府工作三个月时间,搬住了五个地方,有马鞍村、竹园村、王家门村、黄窑村、邢坪村。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主要发生了敌人夜袭扫荡、群众生命财产受到损失等几件事。

1945年元月份,禹县国民党县长席子猷夜袭高崖头、窑沟、东坪、东沟、河东根据地等10几个村庄,进行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们对此进行调查,并慰问受害群众。从高崖头到大碗沟一路东边各个村庄,火光冲天,烧了一整夜,房屋、窑洞被烧数十间,麦秸垛数十个,打死打伤数十人,捆绑拉走妇女10几人,牛羊赶走数百头,如李永贵家被烧麦子、杂粮2000余斤,和其它物资数百件、麦秸垛3个。

打败了日寇,我们又开了追悼会。孟窑战斗,我们虽然打了胜仗,打死日寇3名,俘虏2名,得了战利品,但我们牺牲了2名民兵。在黄窑村我们搭了台子,开了追悼会,表彰民兵英雄,党峰同志上台讲了话,死难家属代表也讲了话,并追授2位死难民兵为烈士。

对汉奸的惩罚,我受了批评。狼洞岭和日伪军的战斗结束后,在东坪打扫战场时捉住了一个汉奸(布衫内装有八响枪一支)和朱池的儿子被押送到县政府竹园村炮楼内看押数天,又被王天一队长带回看押,我听说要枪毙这俩人,我去县政府(在马鞍村)找党峰县长汇报此事,党县长答复不能枪毙,问题弄清后再说。党峰县长让我快回去对王队长说,不能枪毙。我随即从马鞍村赶回邢坪。我走到西邢坪岭上,王队长已经带领区中队把俩犯人拉到西邢坪村对面背阴的山腰,随即我就听到了枪毙犯人的枪声。后来党县长批评我时明确交代,今后不经县政府批准,无权枪毙人。

没有过好元宵节。我记得1945年农历正月十六,我们县府人员当时住在王家门李菊五地主家。元宵节早上,我们正在吃饺子,日寇从蜜腊山背后向我县府方向进攻,遭到我军的抗击。我们县府大部分人员上山做好各战准备,我部队抗日日伪军一天时间,最终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

我军的失利,日寇的扫荡及对我的追捕。1945年元月份的一天下午,我在大峪店街,区中队张清杰秘书到区中队对我说:“小孔,你下午

给大峪店村干部和群众再通知一下,临汝城日本鬼子联合伊川、登封三个县日伪军,从伊川、石道、大金店、小金店、白栗坪向我大峪根据地扫荡,今晚敌人可能住到小金店,明天早晨拂晓可能进攻我大峪店。毛岭防线由张玉林中队把守,日伪军如进攻时鸣三枪为号,说明敌人过来了,干部、群众一律撤离到东西山上,你去马鞍村县政府找我们,一定做好群众工作。”张秘书向我交代后,就往马鞍村县政府去了。我立即就到大峪店区中队,向区中队干部传达了张秘书的指示,我晚上住在大峪店区中队。中队只有炊事员和两个战士,王队长和部队都在东山上前线防守禹县日伪军的进攻。第一天早晨一直没听到枪声的信号,认为敌人不会来了,准备吃饭再走。谁知张玉林中队长把守到半夜后,没有听到敌人的动静,把部队搬到乱石扒村睡觉去了。敌人乘机畅通无阻地过来了,张玉林发现时,再发出鸣枪的信号已经晚了。日本鬼子已进攻到高崖头、栗沟一带,我去大峪店北头和两个区中队战士李四、颜根成速往西北马鞍村方向走去。行至孔窑村南边,日本鬼子从北菜园西岭上冲过来一股,堵住了我们的去路,并扑向我们。我看形势不妙,就拨马而回,分三路回头向大峪方向撤去。日本鬼子急速从我背后追来,因我年轻腿快,一个日本鬼子伸手抓住我的大衣时,我把大衣一闪掉,快速冲出了鬼子的追捕圈,但鬼子仍不停地在我身后追赶,我跑到东峪店街北头,街内外已被日本鬼子占领,背后有追兵,前边有日本鬼子堵住去路,在我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发现大黑山脚下土崖头斜着上下有个大流水洞,我急忙躲到里边四个小时,才免遭鬼子的追捕。

## 我到抗大去学习

1945年3月,由党峰县长介绍我、于光、于凤鸣、王金柱四名青年到巩县皮司令一支队豫西军事干校(后改名抗大河南分校)学习,编入一中队。指导员张毅,队长姓吕,大队长、政委李其堂,教育长史向生。学习的内容有毛主席《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各阶级革命》、“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派”等重要内容。皮定均司令员、徐子荣政委、郭林祥副政委、方升普副司令员都给我们作过

报告、讲过课。青天下面是教室,树林里面是课堂,地球上面是凳子,膝盖上面是桌子,手拿铅笔,把废纸订起来当记录本用。早晨5点是军训,上午野外听讲课,下午分组来讨论,晚上歌声响亮,夜间放哨、站岗。三个月期满我留校,当了班长,做骨干力量,这时该校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河南分校。我们临汝县大峪区去巩县抗大第三期学习的有李仁义、高申、郎长极、刘同章、贾六斌、高天福等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宣布投降,但不缴械。我们皮徐部队向日军占领的城市开始大反攻,打下了登封、密县两个县城后,兵临偃师县城西部,准备攻打偃师县城和洛阳城,突然遭到国民党第八军的阻击,我被迫撤回巩县并村一带待命。农历的八月,首长传达中央命令,要开始打运动战,我们皮徐部队从巩县、荥阳一带集结,经过偃师、密县到登封白栗坪一带集中过了八月十五中秋节,整编了队伍,成立军区教导团,抗大军校编为教导团的第一营,团长裴太王,政委张思贤,政治部主任李其堂。

到了农历的九月初一,我们部队撤离豫西根据地的准备工作就绪,就开始由登封县库庄出发,下午行军到达临汝县大峪店,在东湾村宿营。我为了安定战士的思想情绪,执行夜间12点急行军的团部命令,离我家一里之地竟没有顾上回家探望二老双亲和妻子儿女们,就这样忍痛让地远离家乡。第一天早上日出三竿,我们教导团一营到达武窑村河边。前卫部队传来命令说,土匪头子黄万镗驻守李楼寨内,封锁道路,不准我军路过。特务连在寨外与敌人发生了战斗,团部张政委、李部长命我营再组织一个战斗连去增加火力,掩护部队冲出敌人封锁线。我营组织100人的战斗连,营长带领冲了上去。部队冲进敌人的封锁线,经过边打边走、敌人的前堵后追,4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我们的教导团胜利地渡过汝河,踏入四五十里狼虎爬岭。在掩护部队撤离李楼寨战斗时,我们团政委张思贤和团政治部主任李其堂受了重伤,用担架抬着渡河行军。张思贤政委到舞阳县时,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了。教导团后尾部队被黄万镗匪徒截捕30余人,后被残忍地枪杀了。

以上是我在临汝县大峪区参加抗日革命工作到八路军全部撤离豫西根据地的亲身经历。

(该文根据孔宪斌1983年2月23日撰写的回忆文章整理而成)



近日,洗耳河畔鲜花盛开,市民游玩赏景。

梁杨子 摄

## 汝州手工绿豆粉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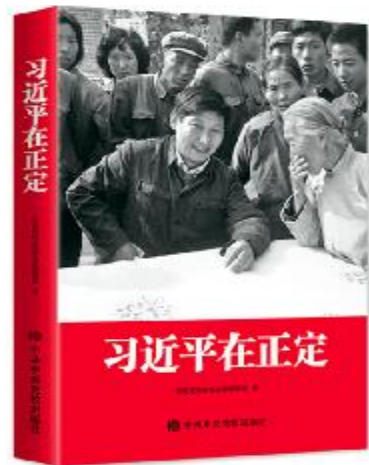


手工绿豆粉皮制作技艺(资料图)

汝州绿豆粉皮仅选用优质绿豆为原料,纯手工工艺水磨绿豆淀粉精制而成,工艺考究,味道鲜美。它薄如蝉翼,明若窗纱,洁如白璧;它性平且凉,食之具有清热解毒、益气明目之奇效。到汝州的客人无不为之品尝到这道美食而赞不绝口。汝州人更是珍视这道名菜,把它作为馈赠外地宾朋的地方名贵特产,也把它作为招待客人朋友宴席中必不可少的一道名菜。国家绿豆粉皮生产工艺经六代传承人继承真传、钻研探索、改进创新,已臻上乘境界,声名远播,广传中州大地。

2014年“手工绿豆粉皮制作技艺”被汝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汝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由田章栓、田志刚、刚鑫雨、杜宏伟

## ·连载·



习近平同志在1984年1月召开的正定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各位同志都应当有敢于创新、开拓前进的劲头,以虎虎生气在思想、作风等方面给群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他还提出正确处理六个方面的关系,就是:当前和长远的关系,优势和劣势的关系,积极性和科学性的关系,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关系,内涵与外延的关系,生产与服务的关系。

1982年到1984年,正定的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农民的人均收入由148元增长到400多元,也翻了一番多。在他的努力下,正定由一个“高穷穷县”发展成了全面发展的先进县。

经过3年多努力,在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的时候,正定县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贫困问题相对得到解决,全县有了一股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干部群众都显得有奔头、有信心、有希望。

采访组:您很关注青年干部的锻炼、成长,曾多次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汇报干部工作情况和意见建议,其中也曾提到过习近平同志,请您回顾一下这些信的内容。

何载:去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书《我的八十年:难忘岁月》,收入了我给中央领导同志写的一些信。今天我稍微展开讲一下。

1982年12月28日,我给胡耀邦同志写的那封信,大致内容是这样的:“中央为干部‘四化’特别是‘知识化’采取了重大措施,已为广大干部称道,但直接提拔仍只能限于极少数,只有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干预才有可能。”

我给胡耀邦同志举了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我举的就是习近平同志。我写道,他“今年春天被派到河北省正定县当县委副书记。经过半年多工作,由于能吃苦耐劳,深入群众,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不但获得干部和

群众的赞扬,组织部门还准备考察其表现,适时给予提拔”。

“他们半年以前还在机关默默无闻,刚下去时又有争议,但仅仅半年,引起了强烈反响,特别是一些曾对知识分子有偏见或有不满的同志迅即改变了看法,认为是‘好苗子’‘信得过’‘放得下心了’。”

“据调查,全国1700万干部,有大学程度的284万,约占16.7%,其中以上海、天津比例最大,分别为27%、25%,新疆、云南最少(均为10%)。如果能抽2%的人下去,有56800人,将是一支强大的后备力量。”“我们要较快速度过青黄不接的局面,不但需要长远规划,也需要这种‘投资’和‘基本建设’。”

两天以后,胡耀邦同志就批示了这封信,并抄送几位领导同志:“大专院校刚刚毕业的学生使用、锻炼问题和提拔知识分子的问题,具体怎么样配备,怎么提拔,应该系统地研究一下。”“请你们研究清楚以后,提出一个大致可行的政策,不要把事情设计得太繁琐、太死,而要提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由此可见胡耀邦同志对此事的重视。我没有想到,我写给胡耀邦同志的这封信,经过他批示,就形成了中央的一个文件。

1983年2月5日,我又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一些工作。“春节期间,我到河北省邢台和石家庄住了几天,接触了一些群众和干部,亲身感受到党的政策所发挥的巨大威力。大家说‘翻身多亏毛主席,致富要靠邓小平’,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干部问题,要向你反映。”

我向胡耀邦同志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三个是这样的:我们党在培养使用年轻干部问题上采取的“扶上马,送一程”的做法,开头很好,但时间不宜太长,应以班子基本就绪为限。”“例如正定县县委书记习近平等年轻干部都是省、市、区认定的‘好苗子’‘信得过的优秀干部’。一些同志建议,对他们应放手使用。他们虽是大学生出身,但都各在基层摔打了七八年,夯实了群众工作的基本功,都能埋头苦干,忠党爱国,勤于学习,善于团结干部。有些同志反映,他们虽被扶上了马,但缰绳还没给他们。”

第二天,胡耀邦同志就对这封信作出了批示并抄送几位老同志,认为“建议很有见地,请考虑如何成为全党的观念”。这个评价很高了。

后来,我又给胡耀邦同志写了第三封信,这是一次汇报会的简报,而这个汇报会则源于胡耀邦同志对中组部的一个指示:“你们这些人没工夫下去,可以请一些县委书记来组织部汇报,打通上下级的联系。”

1984年9月22日,中组部根据胡耀邦同志指示召开了一个汇报会。我是中组部秘书长,汇报会的具体工作由我来做。我找了十多个县委书记到中组部来汇报,河北一次就来了四个。(未完待续)